

10 海门风帆

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到了清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而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大部分港口城市，因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新的中心港口城市的相继形成和出现，自身的功能局限或产业圈和贸易圈的转移而失去了市场竞争力而衰退了。而合浦海上丝绸之路还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再一次印证了合浦始发港地位的重要性。

清王朝建立之初，面对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南明王朝的抵抗、郑成功及其后人军队的反击，清政府采取了严厉的禁海措施。如顺治十三年，清王朝就颁布了禁海令：“自今以后，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不许片帆入口。”（《清实录·世祖卷》）。顺治十八年八月，为使郑成功无内地物资接济，又下达了“迁界令：“令闽、粤、浙、江四省居民向内地迁移三十里，禁渔舟商船出，界外房屋村庄渔船尽予焚毁。”（《清实录·圣祖卷四》）十二月十八日（农历），又重申禁海。在清王朝严后的海禁高压措施下，海上丝绸之路国内航线港口城市的商贸交流遭受到沉重的打击。

清朝入主中原，为了防范汉族的反抗，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限制措施，“海禁”就是其中之一。合浦地处两广，又是与安南等东南亚各国交往要襟之地，加上明朝大将军郑成功在台湾称王，不时派出战舰从东南海岸出发，往来于琼岛与北部湾之间，以合浦沿海作为据点。因此，清朝的“海禁”对合浦的影响尤为巨大。

早在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也即清军攻占廉州仅四个月，清王朝就颁布命令：“广东近海飘洋私船照旧严禁。”民间的船只一律不准出海。

合浦时属广东，当然也在其中。顺治七年（1650年），郑成功部将攻占了钦州龙门岛（时龙门岛属廉州府辖）。十一年（1654年），郑成功又派水陆总兵率战舰百艘，准备驶至廉州湾与南明李定国部会师。对此，清王朝当然不会坐视不理，顺治十七年（1656年）六月，又重申禁海令，自今以后，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不许片帆入口。由于当时台湾是明定国公郑成功控制，与清王朝成对峙状态，“海禁”令特别针对广东沿海，尤以时属广东的合浦沿海。尤其是顺治年间，郑成功部多次攻占时属合浦所辖的龙门岛，自顺治四年至十八年，就有八次战役是在龙门岛发生的，而合浦就是中转站或据点。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清王朝又颁布新的“禁海”令：“为使郑成功无内地物资接济，闽、粤、浙、江南四省滨海居民向内地迁移三十里，禁渔舟商船出海，界外房屋村庄渔船尽予焚毁。”十二月，又再次重申通海严禁。一年两次颁发禁海令，由此可见形势之严峻。

康熙皇帝即位，“禁海”也是头等大事之一，康熙元年（1662年），清王朝专门派大臣科尔坤，兵部侍郎介山到广东执行“海禁”措施。规定从大虎门至钦州防城一带，沿海居民内徙50里，并设排栅，严禁出入。同年，又在廉州设立北海镇标及城守营，将东起阳江，西至东兴的海防列入北海镇标驻防范围，实行军事化禁海。这次军事化禁海一直继续至康熙八年（1669），才“弛迂海之禁”，撤销了廉州沿海50里之排栅，改为汛治，第二年才“复沿海居民旧业”。这里是说，廉州沿海的居民此时才能够出海捕鱼或到各珠池去采珠。为了加强海防军备，康熙九年（1670年），又在廉州府城两南的乾体港设置了乾体营，作为廉州水师营的军事基地。合浦的“禁海”至此应该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

可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八月，吴三桂部下的将军率军攻占了廉州府城，俘廉州知府徐化民，同知田钟雨投降，合浦知县金世爵战死。接着，吴三桂部又乘胜追击攻占广东，两广总督，广两巡抚，广东巡抚等均投降了吴三桂，廉州府辖地因此成为清王朝与南明军队争夺的焦点。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月，廉州府又重被清军占领，十七年六月，郑成功派总兵官率军围攻廉州，激战至八月以清军获胜告终。经此之后，清王朝加强了对廉州沿海的军事控制，在廉州设总兵官，把钦廉及至电白、吴川的海防归为一体，间断性的“海禁”变成了常规性的“海禁”，并设立了海巡制度，守备、于总、把总每日都要带领战船巡海，参将、游击官则每月会巡一次。此外，还建立了连环互保制度，规定廉州等府渔船以十船编为一甲，以防止“奸细”混入。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为防止“海盗”侵扰，两广总督福安康制定的“禁海”章程中规定：“将濶州、斜阳二岛（时属廉州府辖）居住的无籍贫民逐回原籍，所居草寮概行烧毁。其它州、岛亦一律清查严禁。”这已经是竭泽而渔、为丛驱雀的行为了。

合浦的“禁海”一直延续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是年九月，乾隆皇帝亲笔朱批：“各省海岛除例应封禁者欠已遵守外，其余仍准居住，免其驱逐，零星散处人户，皆系贫民，渔出洋采捕在海岛捕在海岛暂搭之寮房，亦应听其居住，毋烧毁。”这事实上就是“禁海”的终结了。清王朝历时一百五十年的“禁海”，给合浦社会发展和民生造成了诸多障碍，但也刺激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功能迅速向军事化转换。

尽管在清王朝的严厉禁海高压中，合浦始发港却没有像海上丝绸之路

其他港口城市那样，因海路被封闭而处于萧条状态；相反合浦因为始发港特殊的区位优势，成了清王朝军队、南明王朝军队、郑成功军队还有吴三桂军队反复争夺的军事基地。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波光帆影被兵车船楼的刀光剑影、大将星旗鼓角所代替，合浦始发港的海面上，一时间成了千军卷动、万帆争流的战场。

南明王朝的合浦之战。1644年4月，清军进入北京，明朝皇室朱由崧跑到了南京，于5月建立了南明王朝。10月，清王朝在北京成建立，纪元为顺治元年。于是，清王朝与南明王朝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南北对立。合浦时属明王朝的势力范围时属清王朝势力范围成了这两个王朝争夺拉锯战的战场。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南明王朝被清军追击，退出南京后跑到广东肇庆建“都”（时合浦属广东），并攻占了广西大部，作为南明王朝后方的合浦，一下子变成了前沿阵地。第二年三月，清军李成栋部总兵马汉挥师直指，攻陷了廉州，逼使高、雷、廉三府同时降清。

清军的军事占领并不能征服民心，廉州府的周边地区还在不停地展开反清战斗，使清军四处“平乱”，首尾难顾。不到三个月，南明镇国将军朱统鉴。率军兵围攻廉州城，此役双方相持了三个多月，最后以朱统鉴于十月十五日攻占廉州府城告终。可是仅十天后，清军攻占了广东全境，并实行严厉的海禁，廉州成了一座“孤岛”，不久又落入了清军手中。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清军将领李成栋因不满只得了个广东提督的官职（李啜是明朝徐州部总兵降清的），于是挟持两广部督佟养甲叛清归南明，廉州兵不血刃又归南明王朝所有。从顺治四年三月至顺治五年四月十三个月间，

廉州城先后五次转换于清王朝与南明王朝之间，历尽兵戈战乱。自此之后，由于原明朝郑成功所部攻上了钦州的龙门，南明军队在两广的写事顺利，合浦全境得以安宁，保持了四年的稳定期归属于南明王朝。

到了顺治九年（1652年），清王朝在全国各地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回过头来对南明王朝开展围攻。是年三月，清靖南王耿继茂全军攻破廉州府城，并活捉了南明高、雷、廉、琼四府巡按张孝起。张宁死不降，绝食自杀。清军攻破廉州后，又乘势占领了钦州、灵山。七月，南明西宁王李定国率军猛攻广西，收复广西全境后，于十一月与郑成功部会师海上，合浦复又归南明。但是，时隔三月即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清靖南王耿继茂部又再次围攻廉州府城，是役南明守城兵将死伤惨重，道员（四品）王道光及属僚全被擒。十月，郑成功委托其将领水陆部督林察乘战舰与李定国会师。此时，广西抗清武装已汇集万余人响应抗清，支持李定国。清朝闻讯立即调集多路大军，其中包括靖南将军朱玛喇、平南王尚可喜、广西提督钱国安等，合兵并击打败李定国，夺回了廉州城。此役之后，清王朝在廉州设置了总兵官，标志着清王朝完成了对廉州辖地的军事控制。从清王朝建立（1644年）到南明王朝势力最终撤离廉州（顺治十一年，1654年）历时10年之久，合浦全境才完全归属清朝。

南明王朝与清王朝在合浦进行了为时十年之久的拉锯战，大小战事十一次。除了合浦当时是扼两广通道，固边陲藩篱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南明王朝希望通过掌控合浦作为与郑成功会师合兵的基地。而清王朝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要害之处，也就不惜重兵压境，反复争夺以阻断南明王朝与郑成功的联合。清王朝为夺取合浦，不但动用了八旗军队，还调集

了当时最具实力的“三藩”军队，即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这三位藩王都是投降清朝后封王的明朝重臣名将，由此可见当时廉州府争夺战之激烈。无怪乎崇祯年间广东布政司参议叹曰：“廉州全省藩卫也，关全省则重。关垓埏则尤重。”

南明军队在合浦的活动已使清王朝穷于应付，郑成功以合浦港群为中心，在周边港口的军队行动，更使清王朝顾此失彼。

1644年3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是为明朝灭亡。五月，清军占领北京，十月清帝福临在北京即位，宣布以大清为国号，顺治纪元是为清朝开基年号。同年五月，原明兵部右侍郎马士英奉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由此开始了与清政府为时15年的武装对峙。

1645年，南明隆武帝被清军赶出南京后，即召见郑成功，委以军事。1646年，郑成功在广东南海起兵抗清，并在福建沿海招募兵马，集结军队达10万之众与清国作战。1647年，郑成功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1659年，曾率军一度攻入长江，围攻南京。军事失利后退守厦门。1661年，率部收复台湾，结束了荷兰军队长达38年之久的军事占领。由此以台湾为基地继续进行抗清斗争，其军队经常进入廉州湾一带对清军作战，成为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郑成功派部将郑雄攻占了时属廉州府管辖的钦州龙门岛。此后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的28年间，龙门岛也就成为郑成功部攻打廉州府的跳板，廉州府也就成了郑成功部与清军的主战场之一。

顺治九年（1652年）十一月，南明政权的西宁王李定国收复广西全境之后，立即派使臣与郑成功联系，双方商定了在廉州湾会师抗清的计划，可惜因风汛不合，不利于船队航行而被迫延期。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月，郑成功命水陆总兵侯察率领五镇官司兵（每镇兵员12000人），乘战船百余艘南征，与南明西宁王李定国在廉州湾会师。这次会师掀起了岭南地区的抗清高潮，各地抗清武装数万人响应集结，一举攻下了廉州府城。

为了防御郑成功部的袭击，清政府除了加强军事围攻之外，还采取了极为严厉的“禁海”措施，严禁渔船出海，还将沿海居民向内地迁移三十里，界外房屋村庄渔船尽予焚毁。这就是顺治十八年（1662年）著名的“迁界令”。到了康熙元年，又将禁海范围扩大，规定从广东虎门到廉州湾一带的沿海居民内徙50里，设置了排栅，严禁出入。但是，仍然无法遏制郑成功部的进攻。廉州府辖的龙门岛依然被郑成功部占领，并不时的攻打廉州府城和钦州。

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军收复了台湾，第二年八月（即康熙元年）便因积劳成疾的病逝于台湾。郑成功的部队便由其子郑经率领继续以台湾为大本营，坚持不懈地在东南沿海开展抗清斗争。并于康熙二年（1663年）二月与清军大战于龙门岛，失败后进入十万大山（时属廉州府辖），还在十万大山开展了为期四年的游击战。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反清自立，很快据有两广。康熙十六年（1677年），郑经部将自台湾率船80艘，兵1000余人，攻入廉州湾后进而进攻龙门岛，但被清军击退。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二十三日，郑经又派总兵谢琅率部将张荒、杜起龙等自台湾乘战船来围攻廉州。此战双方

激战异常，攻守经日，最后被清军以两镇总兵的兵力内外合力击退。郑军转而进攻龙门岛又失利，此后，虽然郑成功多次反攻，但因康熙帝在廉州设置了廉州总兵府，乾体营水师及龙门协水师，郑军进攻均以失败告终。

康熙二十年（1683年）七月二十七日，郑成功之孙郑克爽向清廷缴印投降，由此“海疆平静，停止迁界令”，“各省展立界限，俾迁民归里，招垦荒地”。第二年九月，撤销了廉州总兵官，改设廉州营，仅驻兵1000员，设游击一员作军事指挥。

自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李成栋部攻入廉州之后，至康熙二十年（1683年）的36年间，清王朝与南明军队，郑成功军队以及吴三桂军队在合浦始发港展开的大小战事共计有：

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清军李成栋部攻入廉州，此战至三月结束，廉州府降清。

同年七月，南明军队镇国将军朱统鉴率兵攻入廉州城，同月，清王朝调集灵山等地军队到廉州围攻朱统鉴军队。

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郑成功军队攻占龙门岛（时属廉州海防区域）。

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清军靖南王耿继茂率军攻占廉州府。

同年十一月，李定国收复广西后遣使约郑成功到廉州会师。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南明西宁王李定国攻入廉州。

同年十月，郑成功部队乘战船百艘南征，与李定国会师廉州。

同年十一月，清军尚可喜打败李定国，攻占廉州。

同年，清王朝设高、雷、廉总兵府。

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郑成功部攻占钦州城。

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郑成功部攻占钦州龙门（时属廉州海防区域）。

同年九月，清军收复龙门。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部攻占龙门岛。

康熙元年（1662年），清王朝设此海镇标及城营在廉州。

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尚可喜督军攻占龙门。

康熙四年（1665年），清军进攻十万山郑成功残部。是年在廉州设沿海墩台。

康熙九年（1670年），裁广东廉州水师营、改设乾体营。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吴三桂起兵反清。

康熙十四年（1675年）八月，吴三桂军队攻占廉州，知府徐化民被俘，同知田钟雨投降，合浦县知县金世爵战死。

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月，清军尚可喜收复廉州。

同年十二月，郑成功后人军队攻占钦州龙门岛（时属廉州海防区域）。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台湾郑氏军队围攻廉州，被清军击败。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月，清军水师收复钦州龙门岛（时属廉州海防区域）。

为了加强廉州府的海防力量。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清廷裁廉州总官兵，改设廉州营，在廉州府城只驻兵1000名，却加强了龙门岛的防御兵力，设龙门水师协标左、右营（相当于旅一级军事建制），其中之一驻乾体而称乾体营，驻防兵员1634名，战船12艘。第二年，在廉州口设

海关，隶属粤海关，廉州海防由此又多了一项缉私任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八月，改廉州海防同知为理瑶同知，以加强对广东连山县瑶民的管治。

第二年，将龙门协属的乾体营归并廉州营，加强了廉州府城的海防兵力，稍后，又在廉州湾海面设立了海上会巡制度，每月一次。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廷令广东沿海修筑台 116 座，合浦境内自冠头岭至大观港东岸共设炮台 7 座，设置大炮共 30 座，康熙年间是廉州海防建设最盛的时期。

雍正十年，为了强化海防管理，将合浦县丞移驻山口永安城，县丞是大县才设置的官职官，秩八品，相当于副知县一职。由此可见雍正帝对廉州海防的重视。乾隆四年（1739年），移廉州府防城同知驻龙门岛。府同知是正五品官秩，是协助知府专门处理海防的官员。此时，廉州海防职权及职能都进一步扩大。防区范围也伸延至两广沿海。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为使沿海军事要件传递迅速，朝廷专门给廉州府海防辖区添置了马匹。同时又命廉州府海防同知兼管本府所辖三州、县的水利。

嘉庆元年（1796年），朝廷从海安、海口二营拨战船 30 艘，供廉州府主要用于巡防龙门、涠洲海面。由于有了这些战船助阵，嘉庆、道光年间，廉州府海防军队多次在海面上大获战果，其中生擒越南巨盗陈加海等，为越南国王解除了心头大患。光绪八年（1882年），朝廷以“越南事机甚为紧迫”，令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铁壳船）8 艘驶赴廉州，不时驶往越南附近洋面游弋。接着，又从福建拨给“济安”、“飞云”二艘兵轮给廉州府，曾国荃还专门拨兵轮 8 艘，拖船二艘驻扎北海（乾体港）。

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朝廷裁广东阳江水 9 营总兵，改设北海镇总兵，驻廉州。改廉州营为镇标左营，阳江营为北海镇标右营，将原为

高州镇辖的龙门协、钦州营、灵山营、雷州营、徐闻营及石城营（廉江境）罗定协左、右二营拨归驻廉州府城的北海镇总兵管辖。十四年（1888年）九月，龙门水师两营改归北海镇总兵管辖，廉州府海防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



图 10-1
北海旧海关。

从以上在廉州发生的战争及清王朝在廉州加强海防建设中可知，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成了最重要的战争供应补给线，在稳定边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海防建设的加强，清王朝开始恢复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除了解除海禁，最显著有效的措施就是在廉州设置海关。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设廉州口海关隶属于粤海关管理，征收货物税和船钞，这是近代海关征管的开始。根据当时大清沿海税例，只对海上贸易商船收税，捕鱼虾船只及民间日用之物并糊口贸易者，俱免税。由于当时的“海禁”刚刚松缓，海关的征管还是单一的海上收税。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政府进一步开放海禁，“准澳门外国商船往南洋贸易，中国商船往安南贸易”（《清实录·圣祖卷》）。至乾隆元年（1736年），又增设了山口，钦州（时属廉州府辖）二小口和高德、西场、沙岗等

海关分卡，廉州海关因此形成一个具有多种征管功能的口岸管理机构，海关衙门设在廉州西华路（一说在沙街尾与海角亭为邻）。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清政府出于储备粮食的考虑，裁撤了山口圩关税。二月，又特批安南（今越南）大米进口至廉州沿海一带，一律实行低税制，每石大米仅纳税银二厘左右。此举导致进口大米骤增，内地粮价大减。如此一来，谷贱伤农，朝廷很快又停止了在廉州海关施行的这一“优惠政策”。由此可见海关征管的杠杆作用早在乾隆年间就在廉州府应用了。大米的大量进口，廉州府也成了粮食周转储备之地，朝廷专门为此在廉州修建了储备粮库，地址就在今廉州镇上仓街、下仓街。意即上、下粮仓所在地。并且将高州仓大使改为高廉道粮库大使驻廉州。廉州粮库同时也作为战备粮基地，最大批量曾一次调运了一万石粮食供军需。

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压力之下，添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四个口岸作为英国船只停泊装卸货物。此后，清政府于同治十年（1871年）设立了北海关（常关），归粤海关监督管理，并规定凡为外人运货之舢板赴香港者，须先在北海或广州报关。北海常关成为一个独立脱离于廉州府的机构即由此起。二年后，也即同治十年（1873年），正式设廉州北海关。同时也明确了廉州各口征管范围：“近年雷、廉各口税收日绌，皆因北海地方无所稽查，易于绕漏，嗣后以北海为总汇，设关征税。如有进、出口货物，按大关税则征收。并于钦州、电白水东、石城县暗铺、遂溪县赤坎，海康县雷州及吴川、石城、遂溪三县交界处之石门头六处设立北海分卡稽征，亦按大关税则征收。又于钦州平银、长墩、防城三处，设立北海稽查子卡。”（《续通考》）康熙二十四年设置的廉州海关的

对外征管业务，此时已经大部拨归北海海关管理了。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北海正式开埠，并设立外国领事馆，税务司官员也由英国人任命，北海口岸的一部分关税落入殖民主义者手中。廉州海关至此已是名存实亡。清代廉州海关的消亡，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从另一方面已印证了弱国无外交这么一个事实。因为，清代的北海对外开放毕竟是殖民主义者“炮舰政策”的催化结果，这种对外开放是以主权为代价的。廉州口海关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置，到光绪三年（1877年）北海开埠历时共192年。

清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带动了农耕的发展，在朝廷的推动下，采取了开荒垦地，鼓励农耕的优惠政策，带动了农作物种植和引进。



图 10-2

合浦汉墓出土的铁冬青。

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朝廷以廉州府等地民众不习惯耕种旱地，致使有大量未开垦的荒地之故，派出官员前来勘查，由此拉开了廉州府大量垦荒的序幕。为了鼓励民众积极垦荒，清朝廷还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措施，其中包括免税等政策。其间以乾隆年间为最盛。

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乾隆帝就亲笔朱批“准合浦、钦州未复额内难垦税亩，照合浦县下则税额减半”。在减税政策的鼓励下，地方官府也

把垦荒当作一项政绩来抓。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年间廉州府上报的垦荒政绩奏折不下 20 起，其中有虚报，也有实绩。如乾隆十年（1745 年）六月，两广总督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就向朝廷建议：“广东产米不敷民食，高、雷、廉一带的八万余亩闲旷之地可垦种，拟详议劝垦规条。”第二年，乾隆帝就在该奏折中批复：“命将该三府荒地七万余亩，给当地民人垦种，一概免其升科，并给与印照，永为世业。”由于有了这些鼓励措施，廉州府开垦荒地颇有成效粮食富足有余，因此才有了上述朝廷一次就能从廉州府仓调粮一万石供军队之需。

扩大的耕种面积之后，清朝廷又在改革农具方面出新政。乾隆二十年，廉州府门决定在全境推行水车灌溉农田的措施。为了取得经验，还行文规定率先在军队徭役田中实施。

乾隆五十年（1785 年）八月，乾隆帝阅读了湖南巡抚陆燿所著的《甘薯录》一书后，兴趣大发，于是批示：“多为刊布传钞，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贫，亦属备荒之一法”。这是清政府下令推广红薯之始，但据史料记载，廉州府从雍正年间就有种植红薯的记载，可见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在引进外来农作物方面具有的优势。

到了道光初年，木薯种植传入广东高州。由于历史上高州、雷州、廉州基本同属，又同是广东下四府（高雷廉琼），很快，木薯种植就传入了廉州府，之后又向广西的桂平、贵县，宾州等地传播。

合浦气候适宜，土地肥沃，但农耕的发展至明清时期才进入成熟期。主要原因是当地土著居民因历史上采珠业及海捕业的优势而不注重农耕，直至明朝中后期，特别是清中期的太平天国之后，大量客家人迁入合浦境

内，带来了中原的农耕技术和工具，也带来了多种农产品种子，有力地促进了农耕的全面发展。到清中后期，朝廷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发展农耕，多次以政府行为推动新品种的种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户部与工部联合提出“以贍国用”一折，要求全国各地根据土壤及气候条件“广种蚕桑、葡萄、棉花、甘蔗、竹、樟、橡、烟”。并特别表扬了广西及广东廉州府的引种成果。由此可知，今天合浦农业生产中的几大特产：甘蔗、蚕桑、烟叶（在20世纪70年代前合浦农村大量种植，后因政策性停种蚕桑和烟叶）都是在此时发展起来的。



图 10-3

合浦山歌表演《老杨公》，是古越祭祀方式的延续。

现在合浦广为种植的芋头、小麦、三角麦、香菜、甜薯、芥菜、狗爪豆等农作物也是由客家人带入，经过清代的长期培育种植而发展起来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一些民俗风情也得以激活，合浦歌圩就是其中一种。

合浦歌圩古已有之。青年男女在歌圩上以歌传情，互定婚配早成习俗。由于歌圩上的以歌传情是赤裸裸的情感表达，因此有许多优美的民歌流传

下成为经典，特别是作为合浦山歌中“守本戏”“老杨公”至今传唱不已。歌传情，歌为媒，这种毫无遮拦的情感表达，反映出民间艺人和歌手的创作才华之外，难免引起官府的反对和禁止。因此，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官府衙门下了一道禁令，严禁合浦歌圩上进行“互歌婚配”，违禁者将以“伤风化”处理，重者甚至被处以充军流放及至处死。

当年合浦歌圩上“互歌婚配”是什么样的情形？

“新买纸扇白又红，一边画风一边龙。画龙画风哥无想，单单想妹好姿容。”歌圩上的青年男子买了一把描凤画龙的纸扇，他在歌圩上寻寻觅觅，就是为了见到日思夜想的情人妹妹，要与情人妹妹“龙凤配”。而情人妹妹“互歌对答”更有意思：“鸭嘴无比鸡嘴尖，妹嘴无比哥嘴甜。妹想同哥亲只嘴，三年无用买油盐。”一边是“单单想妹好姿容”的急切心情，一边是“妹嘴无比哥嘴甜”的考虑犹豫，灵活灵现地表现出歌圩上相恋男女的心态。很明显，这种自由婚恋方式与封建礼教是格格不入的。

歌圩上的情感表达又是热烈的，也许是这种情感表达最容易点燃青年男女心中的激情火花，因此，歌圩上的“互歌婚配”成功率也不会低。“蜘蛛牵网半边丝，无挂壁根无挂篱。挂篱挂壁有人见，挂在哥心无人知。”这是女主角“抱琵琶半遮面”的相思诉说。她对歌圩上结识的情郎的万般思念，就像蜘蛛网上的丝（思），千丝万缕缠绕心头，却又怕别人知晓。而男主角的表述则是毫无遮拦的了：“妹阿姨，阿哥相思你无知。月大思妹三十日，月小思妹了无期。”他直截了当呼唤着与情人相见：“妹又回，三朝七日你要来。三朝七日来一趟，莫让大路上青苔”。这是多么急切的期待啊！三天七日的圩期，对这些热恋中的情人来说就是“了无期”的漫长。在“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敢于冲破传统的盲婚哑嫁，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事实上，这种歌圩上的“互配婚姻”是难以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所接受的，官府的严禁措施就是因为有着广泛的家庭基础。



图 10-4

合浦山歌表演《老杨公》，是古越祭祀方式的延续。

古属百越族群，乌浒族群的聚居地之一就是在合浦。合浦“俗有四民”中的俚人、柴登即是壮族。据《壮族通史》记述，至元明清时期，合浦依然是壮族人口的重要分布地区（如唐代廉州壮族人口为 13029 人）。元明以后大量中原移民（客家人）迁徙定居岭南，进入合浦，才改变了合浦人口的民族结构。到了清代，合浦境内还有大量的壮、瑶族居民并有固定的壮、瑶田。乾隆十九年（1754 年）二月，两广总督班第为解决合浦境内的壮瑶问题向朝廷提出了建议：“广东合浦县永平司巡检地方，为瑶，壮出没之所。明成化年间，曾设有分守要隘之俚兵、瑶兵及供其耕食之田地。至本朝初年，尚存俚、瑶田 1448 亩”。由于这些专供壮、瑶人耕食之田地“多被诱骗典当”，这位两广总督建议朝廷订定章程，“如确贫不能守业者，只准本族，本地之俚、瑶承买，不得外售于民人”。由此可见当时合浦是汉、壮、

瑶杂处而居，壮、瑶都有歌圩“互歌婚配”的民俗习惯，即使官府明文严禁也无法禁绝。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官府在合浦严禁歌圩“互歌婚配”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

清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往也得到了扩展，在与安南的关系上，廉州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合浦与越南（古称安南，嘉庆七年（1802年）安南国王向清廷纳贡请封，并请改安南为“南越”，嘉庆帝认为“南越”是两广古属，不准其以“南越”称之，准以“越南”，（即南越之南）为名，并封阮福为越南国国王，“越南”之称由此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唐代，朝廷在全国设置六大都护府，安南都护府是其中之一。此间由于安南境内战乱，安南都护府行营曾一度设置在廉州府。唐高骈就曾以安南都护的身份，坐镇廉州府城，这就是史称之为高骈海门屯兵。

到了清代，合浦与安南的关系更加密切，除了经济贸易上的密切配合之外，人员往来也日益频繁，各方面的互补性也更加明显。如当时廉州府是北部湾沿海布防的重要军事基地，担负着供应下四府（高雷廉琼）军需粮饷的任务，朝廷专门在廉州府城设置了战备粮库，今廉州镇上仓街，下仓街就因是当年战备粮库的仓储故名。由于这个缘故，廉州府的粮食供应波动很大，稍有灾害便会产生饥荒，因此，清廷不时采取从安南进口大米的措施来抑制粮价，并明文规定，从安南进口大米至廉州府可以享受优惠税收。如前所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清廷就规定，从安南进米至廉州府，每石纳税银仅二厘。低税率促安南米大量进口，内地米价大减。

因为合浦与安南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多，双方人员交流也成了平常事，

于是就出了一件令官府头痛的事，那就是廉州府的商人到安南贸易时，不时有与安南女子相好并带回家中做妻子。而一些安南女子也不时随着商贸往来的船队来到廉州府后，就不再回去，留在当地寻觅如意情郎，自嫁自婚，加上当时廉州府境地有歌圩“互歌婚配”的民间习俗，一些安南女子往往也就借助歌圩去寻觅夫婿，因此也就会有一些“伤风化”事情发生。于是，清廷雍正十年（1732年）在合浦严禁歌圩“互歌婚配”之后，乾隆九年（1744年）又明令廉州府全境禁止娶安南女子为妻。为了防止南安女子从陆地上私自跑来“互歌婚配”，清廷又令沿边界30里以内广种筋竹为隔篱。

除了经济、人员的往来，军事上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道光十二年（1832年），廉州府海防区内的白龙尾洋面上经常有海盗船三十余只集结在一起，海盗人数多至四五百。这些海盗船以涠洲岛为据点，以白龙尾岛一带洋面为抢劫地点。由于白龙尾岛距越南很近，廉州府水师一出动，这些海盗便退入邻近的越南红河口一带躲避，致使围剿无功。道光帝于是年十一月专门御批，谕两广总督卢坤“该处既与越南相连。可咨该国合力会剿”。卢坤遵照道光帝的喻示，与越南有关方面联系，联合采取会剿行动。于第二年三月，把这伙海盗逼至廉州湾海域，不但将经常在廉州冠头岭一带游弋作案的海盗头巨林致云抓获，还生擒了越南国的头号巨盗阮保及随从70余名，由此“洋面肃清”（见《清实录·宣宗卷》）。到了光绪年间，廉州水师营的巡逻兵轮则将白龙尾纳入布防区域，定期巡逻，以保廉州海境平安。

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对外商贸的重要通道。虽然自唐朝以后，合浦始发港的枢纽地位被广州、

泉州等地所代替，但以合浦为港口的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商品交流从来没有间断过。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虽然是从江苏的南京港、刘家港、福建的太平港起航，但其所走的航向基本上是沿汉代海上丝路的航线前进，因此，史称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辉煌、鼎盛时期。



图 10-5

合浦千户防御所永安城中的明代大士阁。

清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虽然活跃，但仍然不时的受到来自朝廷的限制。如清廷为防止南明政权与台湾郑成功部队会师，为隔断天地会、太平天国军队的活动范围，多次实施严厉的“海禁”，甚至把沿海五十里内的居民都迁入内地，并在“海禁”范围设置栏栅等。同时还严禁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输出铁具利器。对盐、大米等商品交易也屡次采取限制措施，使得本来就处于逆差劣势的合浦海丝路对外贸易更加举步维艰，严重地影响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发展。

清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贸商品中，还有一种值得特别一提的商品就是被史学家称之为“殖民主义者用炮弹送来的毒品——鸦片”。殖民主义者自光绪三年（1877年）从北海口岸通过正常贸易渠道将六担鸦片运入廉州府开始，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崩溃的37年间，殖民主义者通过

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共“进口”鸦片 10932 担。这些鸦片之所以能通畅无阻地“进口”珠乡，毒害民众，一是当时的海关由殖民主义者把持；二是炮舰政策武力护送；三是把鸦片贴上“洋药”的标签。鸦片大量输入的后果是十分恶劣的。据当时的官府资料显示，廉州府（含北海）市民有 2% 以上吸食鸦片，官僚地痞中吸食鸦片者达 50%。



图 10-6

廉州古城老街阜民北的“戒烟药膏专卖”，其实是与日寇暗中勾结贩卖鸦片的店铺。

近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能够短暂的复兴，与合浦的地理经济位置和军事地位关系极大。钦廉四属（合钦灵防）基本是古合浦郡或廉州府的辖地（钦州于光绪十四年升为直隶州时，清廷才拨灵山、防城归钦州管辖），八属地区在历史上也不同程度的曾经归属合浦郡辖。而八属联军的军事首脑或是合浦人，或以合浦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因此把合浦当作腹地。此外，在粤桂战争，讨伐八属军，国民革命军南征等重大战役中，合浦都处于交通枢纽，战时兵力调动，粮草物资运输，大都是以合浦为中心，除了北海港、西门江、总江口、乾体港等交通要害部位被用驻军防地之外，南流江两岸更成了各路兵家争夺之地。如滇军攻廉州，八属军攻廉州、北海等战

事，都是以抢占南流江上游为制高点。在讨伐邓本殷军事行动中，广州大元帅府还专门派出永丰舰运来军饷、弹药助战。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合浦经济的破坏，甚至是倒退。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刺激了合浦运输业的发展，在另一个角度上看，也促进了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在廉州西门江码头一带，生意最兴旺红火的埠民街，就是近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短暂兴盛的见证。当时，倚江沿岸而建的廉州埠民街全长达 1550 米，骑楼式近代建筑群最多时超过 300 幢，各种商号店铺 200 多间，其中以爆竹烟丝，糖饼店铺为主。如烟丝铺（厂）连片 30 余家，爆竹铺连片 20 多家，钦廉四属的商品几乎都是在这条埠民街上流转。而廉州城内以埠民街为主的商铺则发展至 1200 多间。一些大宗商品在钦廉四属形成垄断地位。如民国 20 年，廉州城内经营纱布业的商铺有 29 家，随后发展至 44 家，占全城商业额 50%，米行商铺有 80 多户，几乎垄断了灵山、浦北（时属合浦）、钦州在廉州、北海的销售。水产行和柴木行则理所当然成为钦廉四属的集散中心。西门江上，终日是排艇穿梭，舟船争流，帆樯如林，热闹非凡。



图 10-7

北海英国领事馆旧址（今北海一中校园内）。



图 10-8

北海法国领事馆旧址（今北海市迎宾馆内）。

如果说西门江码头所在的廉州城是近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江河经济的前沿辐射区，北海近代海运史的发展就是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的伸延。北海港凭借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之利，海运业起步早，对外贸易活跃，除了丝绸，陶瓷等大宗商品的常规出口，其他特色土产交易也不断扩展，带动了海运贸易的发展。如宋代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中，就有北海出口橄榄香的记载。《宋会要辑稿》一书则记述北海冠头岭是交（州）广（州）海路的重要集散港口。元朝在廉州府设市舶提举司，专门负责外国商船的管理和抽税。到了明代，又设置有盐务，珠池，河泊等管理机构，北海港的海运业务可以说是持续发展的。但是到了明末清初，由于倭寇入侵滋扰，郑成功部与清军的对抗，北海港一带海域成了主战场。据史籍记载，从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开始对广东沿海（时北海属广东廉州府）实行“近海禁私船”起，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迁界禁海”，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解除“禁海”的150年间，北海成为军事港口。此后，海盗蜂起横行，北海又成为军事防御缉盗的重要基地。嘉庆十四年（1809年），嘉庆帝下旨，谕广东沿海渔船出海实行连环保甲制，官府船队

实行武装押运。道光十二年（1832年）为了清剿海盗为祸，道光帝下旨，要两广总督与越南合力在冠头岭至白龙尾一带海域围捕海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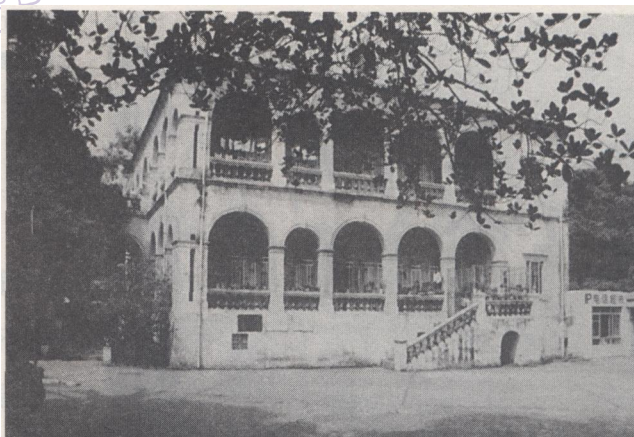


图 10-9

北海德国领事馆旧址（今北海工商银行内）。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第二年清政府对英国宣战，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这也是殖民主义者用炮舰轰开中国沿海门户的开始。北海的海运业在帝国主义的军舰冲击中开始了艰难的破茧之旅。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北海人开辟了北海至澳门的定期帆船航班，至今整整走过了160年。这是北海人在炮声和硝烟中走向世界的一次创举，在北海近代海运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创举，不久便有了北海近代史上的第一条国际海运商业航线。

咸丰元年（1851年），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建造的艚船从澳门首航北海，开辟了北海近代海运史上的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艚船也称“头艚”，是一种运输量较大的木帆船，载重量最大可达300吨。特别是北海尚未有开埠前，艚船的出现，无疑是一种生产力的革新。随着葡萄牙商人这艘艚船来到北海，“头艚”迅速在北海兴起并进入全盛阶段，在短短的十年间便发展至30余艘，成为北海海运的主力，同时也加快促进了其他航线的开辟。

同治二年（1863年），在列强的压迫下，清政府同意增开湖北、宜昌、浙江温州、安徽芜湖和广东北海四个口岸，作为英国船只停泊装卸货物的码头。这是英国商船在北海进行出口贸易的起端，北海口岸是被迫开放的，就是史书所称的“开埠”。同治二年的这次开放，实际上比光绪三年二月十九日（农历，新历为1877年4月2日）的北海新关（海关）开办的“开埠”要早14年。同治十年（1871年），广东北海常关成立，清政府明文规定：凡为外人运货之舢板赴香港者，须先在北海或广州报关。两年后，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政府规定，以北海为总汇，设关征税。并在钦州、电白、石城（今廉江）、海康、吴川设立北海分卡，在钦州、防城设立北海稽查子卡。



图 10-10

北海主教府楼旧址（今北海工商银行内）。

光绪三年北海新关开办后，海关的控制权落入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与此同时，西方海运业也加快了进入北海的步伐。光绪五年（1879年）英国“海南号”轮船开辟了北海至香港的定期航线，客运、货运业务也同时开展。德、葡、日等国的客、货轮也接踵而来。中国招商局轮船也驶入北海港，加进北海海运队伍之列。是年，进出北海港的外国轮船已达286多艘

次。航线伸延至海口、海防、香港。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北海港出现了专运出洋华工“卖猪仔”的外国轮船，每船几百人至于余人，第二年又有德国“威洛号”到北海贩运出洋华工，直达苏门答腊。这一条“卖猪仔”专线一直继续至宣统二年（1910年），荷兰“共班娜号”轮船厂从苏门答腊搭载华工336人归国在北海上岸才告结束。

光绪十六年（1890年），北海，法国、挪威等国轮船又开通北海航线，至此已有八个国家的轮船在北海开通了直达上海、香港、海口、海防，新加坡、苏门答腊六条航线，此后的十年间（至1899年）进出北海港的外舰共2322艘次，总吨位达116万吨，年平均230艘次。旅客出入人次为46294人。随着北海港海运能力的增强，知名度的提高，接着又有美国、荷兰、俄国的轮船公司开辟了到北海的新航线，北海的航线又伸延到上海、广州、台湾、缅甸，经北海中转的货物可以进入欧美市场。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从1900年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十二年间，进出北海港的外轮已达3243艘次，吨位达221万吨。



图 10-11

北海贞德女子学校（旧址今市人民医院内）。

民国成立后，国内的一些轮船公司也着意发展北海的海运业务，一些大型轮船，如广南船厂的千吨海轮，安益公司的两艘 985 吨海轮，航商载重均为 673 吨的“海利”“大司马”，也纷纷进入北海港。而北海本地的“头艙”船队也相应扩大，一些大型的三桅三帆，载重量达二三百吨的“头艙”普遍见用。而美国、法国等轮船公司的大型轮船也来到北海停泊，其中载重 5000 吨的美国太平洋航业公司的轮船也驶进北海港寄泊。民国开元至 1919 年的八年间，进出北海的外轮为 408 艘次，进出吨位 17 万吨，进出旅客人数 5949 人。北海港口成为一个国际港口。



图 10-12

北海森宝洋行旧址 今北海市文化大院内。

在合浦始发港内陆航线辐射带动，以及北海海运事业发展的拉动下，北海的土特产出口出现了一枝独秀的现象。1877 年，北海海关新关开办，也即是通常所说的“北海开埠”以来，先后有多个国家在北海设立了领事馆，北海海关的控制权也全部落入外国人手中。自 1877 年至 1949 年间，

先后轮换了 48 位海关税务司的官员中只有五任税务司官员是中国人，这五任由中国人担任的税务司官员中有三任是代理的。五任加起来的时间只有七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北海的外贸控制权都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反映在贸易经营中的就是大量的工业品涌进来，大量的资源外流。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及常态化，大量的白银也随之流失。殖民主义者掠夺性的贸易手段，严重地压制了北海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殖民主义者利用控制海关的权力，疯狂地向北海倾销鸦片，从 1877 年至 1916 年的四十年间，经海关放行进入北海的鸦片数量就达 12089.8 担，没有列入海关统计的走私鸦片更是难计其数，而这些荼毒北海人民的鸦片全部都是用白花花的大银和陶瓷、丝绸、药材等贵重土特产换来的。

在许多史籍资料记述中，北海市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如《北海市志·工业卷》中记述：（民国）“18 年，全市有家庭手工织布厂 40 多家：木织机 60 多台，从业者 180 人。”在一些史料中则记载有建于 1919 年的高德造船厂造出了机帆船，是北海最早的机械化工厂。似乎北海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没有什么重大的项目，都是些手工作坊。其实有些方面如造船、电力、煤矿、木材加工等，北海是走在前列的。

北海造船工业发展并不仅是以 1919 年高德船厂建成为标志。据《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中记称，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北海的造船工业就具有相当规模，北海税务署为此还专门在造船工场集中的高德设立一个办事处来管理税收。当时高德一带的造船厂“在一个小湾上方，入口处由一大片沙洲护围着，办事处就建筑在沙洲上，沙洲上还轻巧地用木棒或竹竿支起建了许多土棚子。通常也是在高德建造着数目庞大的大大小小

的帆船，还有货船。”当时北海造船工业从实际出发已形成了“企业集群”。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一队全副武装的绿营兵乘船往合浦石头埠，他们是奉两广总督谭钟麟之命，前往石头埠巡查的，主要任务是“隐抵法舰窥伺”。在此之前，法国军舰开抵冠头岭海面后，曾悄然的驶进铁山港“窥伺”，法国军舰要“窥伺”什么呢？就是石头埠的煤矿。法国人利用“永州教案”要挟清廷获取北海铁路建筑权失败后，又提出要“合办”石头埠煤矿。为此，谭钟麟一边奏报朝廷，一边命令廉州府立即招聘200名工人，采取人工采煤的办法先行开矿，“以绝法人覬觐”。于是就有清朝水师和法国军舰先后进入铁山港石头埠的场面。北海的采矿工业就是这样诞生的。

石头埠煤矿的勘探规划早在光绪初年就开始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郑姓商人开始建设煤矿。光绪二十年（1894年），御史钟德祥派员到石头埠实地勘探后，于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奏朝廷称：“煤质甚佳”，建议朝廷采取免厘减税的办法开展招商合作开采。钟德祥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随即，又由商人合股对石头埠煤矿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据当时北海海关税务司二等帮办田三德描述，石头埠煤矿还请“洋师为之督工，刻已挖得油煤，石煤两种。闻说煤质尚佳，经外由外洋运机器到埠”。就在一切按部就班建设石头埠煤矿之际，法国人横插一脚，为了“以绝法人覬觐”，时任两广总督除了命令廉州府用人工开采之外，还报请朝廷拨银七万两，把石头埠煤矿改为官办。然而仓促之间，许多技术问题未能解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头埠煤矿只好停办。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头埠煤矿改为商人合股，重新开工建设，并扩挖第二个井巷，还派人去香港

购办新机器，这次挖出的煤炭“煤质易脆”且又不能燃烧。光绪二十五年（1903年），经过了六年的坎坷之后，这个“按照外国水下建设”的石头埠煤矿终于在内忧外患中关闭了。



图 10-13

北海老街珠海路。

与石头埠煤矿同时开工建设的“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还有设在高德的一个木材加工厂。这个木材加工厂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是由中国商人集股公司投资建设的，这个公司名叫怡和公司（在一些史料中称怡和公司是英国商人的，也有称是美籍华人的，这里取《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的记录是中国商人集股公司），在高德村建了一个锯木厂和港口木材贮货场。锯木厂的全套设备都是从英国格拉斯哥市运来的。这套设备有垂直式锯木装置，能够自动地调节木板的厚度，并且能一次锯出 12 块木板条。设备的动力采取七马力的锅炉发电机提供。主要是生产船板、船龙骨和木桶用板，同时也生产黄包车的车轮盖板、车身等。有相当一部分产品

用于出口到越南和日本。工厂建成后每天开工 12 小时，雇佣工人 20 名，还是颇具规模的，也是北海最早的引进机械化设备生产的企业。



图 10-14
北海老街中山路。



图 10-15
北海老街俯视。

到了清末民初，随着广府商人在北海的经商范围不断扩大，除了本土的棉布纺织业之外，又从印度等国家进口棉纱纺织棉布，手工织布业因此逐步发展起来。由于这些手工织布都是中国传统工艺生产的，适宜于一家一户的生产需要，因此发展较快，迅速成为北海近代工业的主打产品。除了生产土布之外，也开始生产毛巾，每台机每天可生产 3 打（每打 12 块）

毛巾，每打毛巾的加工费是15先（铜钱）。一台织布机一天可以织布4丈，每丈布的加工费是10先。一个家庭安装一台或几台织布机的家庭纺织作坊在北海已相当普通，成为市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起于近代北海的纺织业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工业，至今算起已近百年。起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电力生产、晚清的皮革加工业在当时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清代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发展，也推动了民间商业机构的发展。

北海的商会机构起于晚清，据《北海杂录》一书记称：“北海一埠，店铺不下千间，而大中商号约四五十家，以广府人尤占多数，本埠生意则以同治年间为最旺。”广府人是指广州府籍的商人，是对包括今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市商人的通称。北海商会的出现，最先是由广府人成立的。早在嘉庆年间就在廉州成立了广州会馆，这算是商会机构的雏形。到了同治年间，广府人在北海先后成立了敬义堂和高州会馆，“以为会议之所”。其中敬义堂建于同治元年（1862年），高州会馆建于同治七年（1868年），这就是北海最早出现的商会机构。

商会当时的职责是“凡钱债官讼及交涉事，均集堂会议，而代表任之”（《北海杂录·会馆》）。也就是说要发挥协调作用，沟通商家与官府之间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是“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会馆由各商家选出的代表担任“驻堂”，即专职干事。会馆的经费开支由会员商家分担。敬义堂的规模较大，资金较充足，因此聘请有常任“驻堂”。常任“驻堂”是广东三水人梁保三（“驻堂”者是要有一定的声望和资历的乡绅来担任）。高州会馆的规模相对较小，“会馆积蓄无多，故无聘请代表人”。商会除了发挥协调作用，还有祭祀的功能，每逢春秋二祭，也就是广府商人聚集会馆商

议事务，举办祭祀之时。因此，参与地方上的慈善机构事务，也是会馆的重要议程，主要是兴办“义庄”之类的机构。广府人开办的慈善机构在廉州有长春旅馆，在北海永兴岭和独树根有广府义冢，黄坭窝岭有阳江义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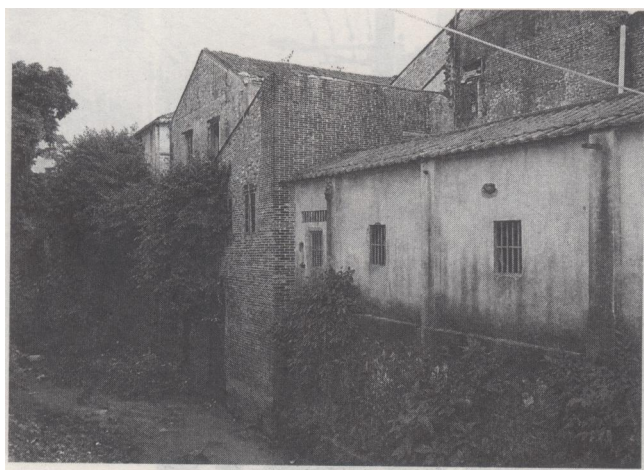


图 10-16

廉州古城沙街尾，元代提举市舶司、明代采珠提举司、清代的海关都设在这条街道上。

关于商会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 1882~1891 年》中是这样记述的：“北海有两个商会，敬义堂及高州会馆，前一个对社会有较远的影响，后一个从名称上就知道为高州人谋利益的。敬义堂的会员是本口岸主要商人，会员每年向总基金捐赠该年进口货值的千分之一。有一个理事会，工作是义务的，有一个领工资的秘书。商会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会员谋福利，必要时也提供金钱的帮助。”

高州会馆的成员多数是劳动群众，主要是包括小商贩，搬运工人及抬轿工人等，搞的大都是关于个人利益的工作。



图 10-17

北海的街渡巷口，是清代合浦、北海商船的主要港口码头地，在今北海市珠海路口 92-98 号。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经广东省政府批准，北海成立了商务分会，属于广东总商会下辖的分支机构，也算是引起了政府重视，有点半官方的意义了。第二年（光绪三十三年），北海商人发起成立了本埠商会，但是，出于某种考虑，该商会规定，凡加入北海商会者，一定要是北海本籍

的商人。把广府商人排之门外，这种考虑是带有偏见的。用时任北海税务司阿歧森的说法，排挤广府人是“畏其财雄力富，当持权柄”。也就是说担心广府商人财大气粗，控制了商会。这样一来，虽然有了一个完全属于北海籍商人的商会，却因为排挤了广府商人，“广府商人皆不见纳”，“未几其会即就消灭”。这个“北海籍商会”不到半年就夭折了。为了解决商会与商人之间的贯籍之争，同年六月，北海籍商人和广府商人共同协商，成立了新的北海商务分会，并明确规定，会员的籍贯不受限制，接受章程者均可入会。新的商会不但办事效率提高了，还增加了新的协调功能：“凡有关商业之事可与地方官自由讨论。”（《北海海关 1877-1945 年贸易资料摘编》）斯时，北海商会确实也做了一些有影响的事情。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为了抵制奸商利用法国租界走私逃税的弊端，北海商会发起请愿，要求清廷在广州湾（今湛江）增设海关卡征税，以加强对走私逃税者的监控管理，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北海籍商人发起成立只许北海籍商人参加的本埠商会后，北海商会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即分别由下广府商人组成的“南行”分会和由上广府商人组成的“北行”分会。“南行”分会是北海籍商人，会址在今民权路。“北行”分会是广东南海、佛山、九江籍商户，在今民建一街的广州会馆设会址。“北行分会”的会员都是经营大宗进出口业务商户，当然财大气粗。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直至广东省商务总会批准成立北海分会，指令将南北分会合并才结束。宣统三年（1911 年）北海商务分会新会址建成，地址在今中山西文明粮店，北海商会搬入新址办公后实行改组，选出关泰号的老板关星渠为首任会长。

民国期间，北海商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维护商户和民族权益方面也有所作为。北海商会据实电请内务部、盐务署，要求减轻北海渔民、盐民的税赋，获准盐税由每担现征五角一分改为二角。民国十九年（1930年）桂军侵入北海，令北海商会向商户筹集款项以充军饷，遭到了商会的抵制。

抗日战争期间，北海商会发动本埠商户抵制日货，日寇占据涠洲岛对进入北海港的物资进行掠抢封锁，北海商会和北海商户冒着日寇残杀生命，没收财资的危险，齐心协力“群策群力，抢运越南粮食货物，以救燃眉”，“增强我方抗战货源”（《北海商会请免税电报》）。为了使北海在日寇封锁掠夺中能够维持抗日斗争的营生之需，北海商会以代主席黄则林领衔，联系其他行业公会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向财政部长孔祥熙发出电文，要求中央政府对北海予以免税。此一请求得到了财政部、行政院的专函批复同意，并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明令：“现值抢运期间，争取物资，至关重要，该处商民由国外抢运之货物登记手续，自可酌予以宽办理。”当时的中央政府给予北海的特殊待遇是罕见的。

明清以后，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功能的急剧转换，固然有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及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始发港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影响，但其区位作用并没有消失。相反，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随着北海口岸在同治二年（1863年）开放给英国轮船停泊装卸货物的港口，英、德、法相继在北海开设使馆，合浦、北海的对外开放再度走在前列。



图 10-18

穿越合浦县城的西门江，是南流江入海主干道，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主要出海河段。